

《上帝的人馬》

郭明璋

改革宗神學院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本書由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以下簡稱宗文社），宗文社於1957年成立，它是華人世界歷史最優久的中國教會研究機構，自2000年遷至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樓之後，就在出版與研究方面與該大學神學院成爲夥伴關係。2005年該社出版蘇教授的另一本書：《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這是該社爲2007年紀念馬禮遜來華兩百週年所出版的兩本書。而早在2000年蘇教授已由臺北的學生書局出版《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要評論蘇教授的《上帝的人馬》，一定要先了解這三本書在寫作上一脈相承的關聯性。由於這三本書都是由著名的出版社出版，讀者心理上已經可以肯定它們是學術性的著作。

圖書館學的專業

蘇教授這些書都有一個特色，就是它們可以同時被基督教界與一般學術界接受，當然與他是一位基督徒不無關聯，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專業、寫作動機和他的工作學術環境。蘇教授專業是圖書館學，對書目學、

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

出版及校勘學亦多所研究，他曾長期擔任國家圖書館編輯、編纂、組主任（1965-1992），到英國留學得到碩士、博士學位（1992-1996），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英國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華的印刷出版事業，¹所以他熟悉也收集了許多這個最先向中國傳福音的差會的各種資料、檔案和出版品。²學成返國之後，他先後在國內幾所大學任教，同時也陸續以這些檔案與資料繼續寫作和作研究，尤其是與倫敦會以及馬禮遜為中心或相關的出版印刷事業及基督教人物。這些文章或在一些學術期刊，或在一些學術研討會發表，³先後彙集成這三本論文集，由於蘇教授緊緊扣住這些研究方向，所以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功力，無人能出其右。

這三本書的每一篇文章，因使用的幾乎全都是第一手的差會與宣教士的書信檔案，使他的論述一方面有紮實的資料根據，以及很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釐清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新教在華史不少的語焉不詳的說法，尤其在宣教士本身的性格對其委身的宣教事工發展的影響（例如馬禮遜、郭實臘、裨治文特立獨行的風格），以及宣教士與其本國差會之間的關係（例如馬禮遜的宣教事業為何是以文字印刷出版為主、1826年以後倫敦會為何疏離馬禮遜、裨治文創辦之《中華叢論》（The Chinese Repository）與美部會之關係），作者在這些書中都有極深刻的描述著墨。所以蘇教授避免了華人學界長久以來研究這段時期歷史所存在的一些缺失，這些缺失正如同他曾經這樣批判說：「對兩岸三地研究者更不利的是利用外文史料的限制，第一手的書信檔案與出版品都保存在海外，而且很多都是不易辨讀的手稿。很可能就是這些因素導致以中文寫作的中國新教初期歷史很多是

¹ 蘇精教授在倫敦大學的博士論文見Su, Ching, 'The Printing Press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mong the Chin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6.

² 蘇精教授資料主要來自倫敦大學亞非圖書館、大英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魏爾康醫學史基金會圖書館、英國公共檔案局，以及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參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頁IV-V。又蘇精：《中國，開門》（香港：宗文社，2005），頁XIII。

³ 參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頁IV。又蘇精：《上帝的人馬》，頁XIII-XIV。

泛論性質，有的因襲以往概略性的陳說，或者輾轉拾取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⁴

跳脫研究十九世紀基督教在華史的兩大陳腔濫調

由於不是先有意識型態的前設，蘇教授這三本書就跳脫了傳統研究十九世紀基督教在華史的兩大陳腔濫調：一是熱心信仰基督徒學者的論述，總是強調基督教對中國近代化的貢獻以及宣教士完美的犧牲奉獻精神；⁵二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下的論述-基督教是資本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⁶

蘇教授從研究倫敦會與馬禮遜在華的出版印刷事業，因而探討十九世紀基督教在華的發展，論述範圍也從當初倫敦會的宣教事業，逐漸擴大至其他差會甚至一些獨立宣教士（如阿德希以及後來脫離荷蘭傳教會的郭實臘）的各種直接或間接傳教活動。有關倫敦會以及馬禮遜比較直接相關的印刷出版事業、傳教士、家人、中國基督徒的文章，基本上都彙集在《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中國，開門》這兩本書，所以焦點比較集中、有系統。前書以馬氏的印刷事業為中心，後書以馬氏在華的宣教事業尤其是與其密切相關的人物為中心。

在精挑集結這兩本書出版之後，由於文章的學術水準以及反應都不錯，於是再將蘇教授過去已經發表的其他文章和尚未發表的文章彙總成這本《上帝的人馬》，文章內容是前二書相關些研究的延伸，涵蓋的範圍比較多，全書不像前面二書有比較明確的焦點，論述的範圍有差會宣教士、

⁴ 蘇精：《上帝的人馬》，頁XII-XIII。

⁵ 這是港台包括北美華人基督徒和出版社的習慣性說法，以護教立場為基督教辯護，往往忽略在時空背景下宣教士有意無意間犯下的一些錯誤。海外學者中最能客觀論述這段歷史的香港建道神學院的梁家麟教授，參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書樓，1987）。

⁶ 這是過往到現在，中國三自會以及一些中國教會史學者甚至海外近代史學者相因承襲的說法，也是迎合中共官方的說法，不過近期這種說法已有逐漸鬆綁的傾向。

獨立宣教士、中國傳道人和平信徒、男、宣教士、等等，不過蘇教授在自序中很清楚也很技巧的加以說明也盡量賦予它們一個整體性，所以從本書書名「上帝的人馬」和其副標題「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可以顯示出作者或出版者企圖以一個比較籠統且包容性大的主題，將全書所有的文章都涵蓋其中。

即使如此，本書仍然是瑕不掩瑜，反而在風格上與前二書有所區隔，書中的幾篇文章論述都保持蘇教授慣有的學術水準，不僅探討得深刻而且對基督教在華史的研究有相當的價值，例如本書幾個專題：〈中華叢論的生與死〉、〈郭實臘和其他傳教士的緊張關係〉、〈阿德希及其寧波女學〉、〈洪仁玕與倫敦傳教會傳教士的交情〉、〈黃寬與倫敦傳教會〉、〈百萬新約送中國：十九世紀的一項出版大計畫〉、〈傳教士的考場分書活動〉都超脫了傳統中國教會史的論述，極具參考價值與可讀性，雖然不能說對中國教會史開拓出什麼重大格局，但至少提供了不少不一樣論述和有啟發性的研究議題和研究方向。

宣教士性格、事業發展及與差會關係的時空交錯

前述的幾篇論文中，以前兩篇最具價值，蘇教授在這兩篇論文論述裨治文和郭實臘在華的宣教事業，如同他在《中國，開門》中，對馬禮遜自己發展的事業、領袖型性格、與差會甚至其他宣教士的緊張關係分析，同樣清晰、精彩，這些情形也同樣產生在美國第一位來華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歐陸第一位宣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身上。裨治文從起初辦《中華叢論》的動機和時機都是因著時宜與需要，⁷ 然而因中國福音工場與差會之聯繫不易，裨治文如同馬禮遜也有自己的特殊關懷與負擔，進而因地制宜地發展出公私無法區分的事

⁷ 《中國叢論》由裨治文1830年5月創辦至1851年8月停刊，它是裨治文一生最主要的工作，記載了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社會的各種調查報告，並有許多中外關係的實錄，因此是研究中國近代開端及早期中外關係的重要參考資料。

工，導致他與差派他的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或稱美國海外傳教委員會）宣教期待的落差，甚至關係不和，造成該刊物停刊。本文也釐清過去對《叢論》停刊之臆測。⁸《郭實臘》一文解答了這位在中國教會史上功過評價兩極的宣教士許多令人困惑的問題，以及其特異獨行多采多姿的一生，氣象萬千的宣教事業。⁹

至於〈阿德希〉、〈洪仁玕〉、〈黃寬〉、〈百萬新約〉、〈考場分書〉這幾篇論文都是紮實之作，洪仁玕與黃寬都是中國教會早期華人重要的基督徒，他們都與來華的各差會和宣教士有密切關係，洪仁玕獻身傳道卻又做了太平天國的干王，黃寬與容闈同為宣教士所支持的中國最早的留學生，也是第一位從歐洲獲得醫學學位和醫生資格的中國人，醫療傳教士是他的第一份專職工作。洪、黃等人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背景，如何認同自己又是中國人、知識分子、傳道人之多重身分角色，他們與差會宣教士之關係之浮沉，過往的一些著作往往語焉不詳，蘇教授則做了深入的探討。在十九世紀中國教會是以宣教士為要角與主體，類似洪仁玕與黃寬這樣的平實清晰的研究是頗值得肯定的。

〈阿德希〉一文極為詳實的記載了中國第一間女學的創辦以及阿德希的角色與貢獻；〈百萬新約〉與〈考場分書〉分別探討了因著太平天國的基督教信仰因素，帶給宣教士對福音化中國的強烈期待和行動，以及宣教士渴望得到中國的科舉制度下傳統知識分子的努力。這三篇論述宣教士及其所推動的事工，都是以往中國教會史比較少觸及的，即使有也是輕描淡寫的帶過，很少有像蘇教授這種詳實的研究。

⁸ 蘇精：《上帝的人馬》，頁3。

⁹ 郭實臘或稱郭士立，他是最具爭議性和受非難最多的在華傳教士，中國人指責他，同為宣教士的外國人也攻擊他，他任意進出中國沿海，與鴉片貿易商勾結，鴉片戰爭時為英軍領路，戰後擔任香港政府的中文秘書，他在傳教事業的各層面都成就卓著，例如他在譯經、出版、文字佈道、教育、醫療事工都有所建樹，引進巴勉、巴色、巴陵差會，又成立本土內地傳教的福漢會，卻又誇大自己事工虛報業績，常有驚人之言，他甚至被指控為「世界上最大騙子之一」。

和前面各篇論文相比全書比較弱的兩篇文章是〈早於容闈在美讀書的華人〉、〈廣州一所女學紀事（1857-1866）〉，兩篇文章資料都完整也有其價值，但是在時代性以及中國教會史的脈絡中，意義都不大，是比較可惜之處，也是整本書的小缺點。

最後是蘇教授所寫的一篇書評：〈評顧譯：《馬禮遜回憶錄》〉，這篇書評舉證歷歷直接的批判了顧長聲先生翻譯該書的五大嚴重缺失：譯本內容非常不完整、譯文為意譯非直譯、譯文錯誤隨處可見、譯者經常擅增內容、全書譯名不統一。這是近期難得一見的好書評，我為蘇教授的學術勇氣喝采，華人世界需要這樣的書評。

《上帝的人馬》一書中，除了呈現出與蘇精教授前兩本書《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中國，開門》一脈相承特色，如同學術界和基督教神學界對他的評價：「就是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重新辨析相關史實，除補正前人研究的不足與錯誤之處，更以多個嶄新的角度呈現馬禮遜其人其事的歷史面貌。」¹⁰，《上帝的人馬》同時也讓我們看見蘇教授研究的觸角，逐漸跨越到其他的差會和及其宣教士，以蘇教授精通外文、各種文獻出版品，以及已經委身十九世紀新教來華歷史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們期待蘇教授能將研究的領域從十九世紀上半擴充到十九世紀下半，因為正如同我們前面曾經提及的，十九世紀的中國教會史是以差會與宣教士為主體的歷史，而這方面的研究正是蘇教授的專長，他有能力使華人世界這方面的研就更加紮實。

¹⁰ http://www.cscrc.org/c331_6.htm

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

211